

人人皆革命黨

——從“新革命史”談起

彭 劍

[提 要] 提出“新革命史”這一術語的學者的闡釋,和以該術語為題發表的其他學者的作品,都給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實則近代的革命有著豐富的內涵,都應該成為革命史研究的對象。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這 20 世紀三大革命中,在“傳統革命史”觀照下的被革命者國民黨、北洋、清室,其實也分別是中國近代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中某一階段的主導者。近代中國,在內憂外患的交迫之下,幾乎人人都是革命者,只是革命方案各有不同,因此存在方案的競爭與更迭。

[關鍵詞] 新革命史 中共革命史 國民黨 北洋 清室

[中圖分類號] D231; K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 (2020)03-0171-11

引 言

革命曾經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研究的主題,但是,在 20 世紀後半段,革命史研究卻有退潮之勢,出現了“把中國革命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的傾向”。^①不過,革命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問題,將它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就會使史學研究抓不住要害,造成研究的碎片化。有鑑於此,一批學者或堅守,或投入革命史研究,從而在 21 世紀之初形成了“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②。正是在此過程中,一個新的學術概念“新革命史”出現了。這一術語雖然不能涵括近些年來所有革命史研究的新現象,但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學界將革命史研究推入新境界的努力。

這一概念是李金錚提出來的。據其自述,2008 年,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暨紀念喬志強先生誕辰 8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提交的論文《何以研究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最後一節以“向新革命史視角轉型”為標題。這篇論文經作者修改充實,成為次年他在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舉辦的全國社會史研究生暑期學校的講題《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會史視野》。在那之後,又經修改,以《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為題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③從那以後,“新革命史”這一術語遂廣為人知。即使不以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對這一術語也“如雷貫耳”。^④

那麼,何為新革命史? 李金錚在 2016 年發表的論文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說要給“新革命史”做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大概可以這樣表述:“新革命史”是回歸樸素的實事求是精神,力圖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嘗試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艱難、曲折與複雜性,進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實際的概念和理論。^⑤

這一定義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特別強調新革命史與中共革命史的關聯。其後,在2018年和2019年發表的相關論文中,李金錚也作了幾乎相同的闡釋。^⑥但是,如此界定“新革命史”,總令人感覺有所不妥。由於他將“新革命史”僅僅定位為推進中共革命史研究,加上迄今為止冠以“新革命史”標題的研究成果,全都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且大都發表於中共革命史的專業期刊,這就給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⑦不以中共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可能忍不住問:“傳統革命史”關注的對象還包括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新革命史”卻只關注中共革命,豈不是有窄化革命史研究範圍的嫌疑?若要成為一個更富創意的學術概念,“新革命史”是否可以增強其包容性,擺脫“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致力於理解近代中國的各種革命運動?20世紀初,孫中山將自己領導的革命分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實則尚有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史學革命、文學革命、詩界革命、心靈革命等等絢麗多彩的革命。諸如此類的革命現象,似乎都可成為“新革命史”的學術障地。即使是耳熟能詳的20世紀“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也可再轉換思維,發現新天地。比如,一場革命,有革命方,必然有革命的對手方。通常認為,革命方是革命者,而革命的對手方則是被革命者、反革命者。但這很有可能是低估了近代中國革命複雜性而造成的誤解,實則20世紀三大革命的對手方也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某一段的參與者甚至主導者,也就是說,他們也是革命者。有趣的是,在李金錚與陳紅民討論“新革命史”的時候,已涉及到了這方面的內容。這充分顯示,“新革命史”有成為一個開放性學術概念的可能性,因此筆者樂意就一己所見,在這方面多談一談。寫作的態度,跟陳紅民和李金錚兩位一樣,是為了活躍革命史研究的氣氛,推動革命史研究的進步。

一、國民黨的歷史是“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在2018年舉辦的“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學術研討會上,陳紅民做了一場大會發言,後經整理擴充,以《“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為題,發表於當年《蘇區研究》第5期。這是“新革命史”概念提出以來第一篇正面商榷的文章,認為既然只有研究方法的進步,而在研究的核心內容方面並無變化,就沒有必要在“革命史”前面加一個“新”字;“新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創新是引入社會史的方法,但過於強調從其他學科借用方法,有“學術自卑”的嫌疑;並且,李金錚所闡釋的“新革命史”的方法並不新鮮,因為這些方法乃是“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普遍趨勢,各領域的學者均做過不同程度的努力”;被李金錚稱為“新革命史”代表作的一些作品,其作者並無“新革命史”的自覺意識,有點“被‘新革命史’”了的味道。他還為“新革命史”的完善,提出了四點建議。

針對陳紅民的質疑和建議,李金錚一一作了回應。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兩位關於國民黨的討論。

陳紅民在文章開頭說,他的學術專攻是國民黨史與蔣介石,“對於革命史的研究我雖關注,但沒有任何的研究成果”。他對“新革命史”所提的第四條建議,是“借鑑學界研究革命對象的成果”,為此,他論述道:“民國時期,幾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與決策,深究其背後,大都能找到國民

黨的因素。國民黨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對象，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如果沒有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存在，共產黨的革命歷程（包括其艱難性和曲折性）肯定會大不相同。”^⑧這些論述給人的印象是，作者認為中共才是革命者，國民黨則是革命對象，因此，研究國民黨的歷史不是研究革命史。

本來，李金錚此前所論證的“新革命史”，就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因此，陳紅民的說法，與李金錚的主張是吻合的。以此之故，當看到李金錚在回應文章中的如下論述，筆者難免有點訝異：

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就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這是從對立面的鏡像中反觀自身歷史的有效方法。革命與反革命本來就是難以分割的對立統一體，任何一方的研究都可以促進對方的研究。筆者所提出的“加強區域和層級間關係的研究”，正是提醒這一方法的運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的歷史不僅僅是共產黨的對立面，它也曾有過“革命”的歷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範圍之內，只是迄今少為注意罷了。^⑨

訝異之餘，更多的是驚喜。這一段論述表明，雖然李金錚在這篇文章裡還在重申此前的觀點，宣稱自己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為的是“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其是艱難、曲折與複雜性”，^⑩但其實在他心裡，“新革命史”已有更大的關懷，因為國民黨的歷史既然屬“新革命史”的範疇，則“新革命史”顯然不僅僅是中共革命史。

不過，國民黨的歷史屬新革命史的範疇，這並非李金錚的回應文章探討的重點，而像是靈光一閃的產物。那麼，該如何看待國民黨與革命的關係？國民黨談自己的歷史，總是追溯到1894年成立的興中會，而興中會及其後的同盟會，無疑是清季革命派的主體，辛亥革命的成功，與這一派的努力密不可分。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又有“二次革命”，以及護國、護法諸役，都屬革命事業。至於改組之後發動的北伐戰爭，更是以“國民革命”或“大革命”之名載入史冊。這一些，無疑都屬國民黨曾經有過的革命行為。那麼，1927年奠都南京之後呢？在“傳統革命史”的敘事裡，國民黨“清共”之後就變成了反革命，不再是革命者。但實際上，1927年之後的國民黨也長期以革命者自居。蔣介石的愛將陳誠在其回憶錄裡提到一件有趣的事：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之後，陳誠於1月21日趕到杭州，向蔣介石請示今後的施政重點，究竟是“行憲”還是“革命”？蔣介石沉吟了一會，很肯定地說：“我們當然要繼續革命。”^⑪通常認識中的“反革命頭子”蔣介石，在一敗塗地的時候，居然說出“繼續革命”的話，真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情。從這一記載來看，至少蔣介石自認為是革命的。他在“革命”前加了“繼續”二字，說明他自認為已經革命了一段時間了。同書還記載，在蔣介石說“當然要繼續革命”之前不久，面對中共軍隊的凌厲攻勢，陳誠說過這樣的話：“現已至與反革命者短兵相接之時，亦至革命者與不革命者之分水嶺。反革命者無時不想阻撓革命，但真有革命之決心者，必將因此而益增深刻之認識與努力。”^⑫顯然，他所說的“反革命者”是中共，中共所阻撓的“革命”則是國民黨的事業。

就是敗退台灣之後，國民黨政權也在相當長時間裡繼續高唱革命之歌。僅舉陳誠幾件事：

1952年10月12日，陳誠出席國民黨七大二次會議報告三年來的施政狀況。其書面報告中寫道：“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決不怨天尤人。展望將來，我們深信革命的前途仍是非常光明的。但奮鬥的過程將是異常艱苦的。”^⑬

1954年11月12日，陳誠談紀念孫中山的方法時有言：“革命原來就是犧牲個人貢獻於社會及人類的事業，國父所能貢獻於社會人類的，已無保留地貢獻出來。”^⑭

1955年6月16日上午10點，陳誠到鳳山主持陸軍官校三十一週年紀念慶祝大會。閱兵後發

表講話,有云:“軍校近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是一部國民革命史。……我們國民革命軍有四大口號,即: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實行主義和完成革命。”^⑤

類似言論,還不僅僅出現在公共場合,就是在日記裡,也經常出現。比如:

他在 1950 年初的日記中寫道:“投降乎? 逃跑乎? 自殺乎(自私自欺)? 革命乎? 大家都知道只有革命,但大家都走自殺的路。”^⑥

1958 年 3 月 12 日,陳誠在日記中感嘆:“今年是國父逝世三十三週年紀念,回憶當年,正在東江作戰,當時全體官兵咸抱只有奮鬥犧牲才能補國父逝世於萬一。”與之相較,今日則“彼此爭權爭利爭言爭氣”,革命精神已消失。^⑦

從以上的簡單引證,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民黨在敗退台灣之後,確實並未放棄“革命”言論。這可以作為李金錚所提出的國民黨也曾有過“革命”的歷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範圍之內這一觀點的注解。相信加強對國民黨“革命”歷史的研究,將有助於豐富“新革命史”的內涵。

二、軍閥與革命

共產黨是革命者,國民黨也是革命者。那麼,被國共合作推翻的北洋系呢? 在“傳統革命史”言說下,“北洋”與“軍閥”相連,“軍閥”與“割據”相連,都是負面的,自然和革命無與。但實際上,北洋軍閥也好,其他軍閥也好,大都在 20 世紀的革命中佔有一席之地。

民國何以演變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 長期以來,羅爾綱的研究使人們相信,是由太平天國興起後出現的督撫權力加重(“外重內輕”)現象演化而來。^⑧而近年來李細珠的研究則顯示,由晚清督撫演變成民初軍閥的少之又少,軍閥的來源,多為新式軍人和革命領袖。^⑨

李細珠的發現很有意義。有一部分革命將領成了軍閥,也就是說,這些軍閥原本是革命者。細究起來,即使是來自新式軍人的軍閥,大多也曾經是革命者。如眾所知,在袁世凱玩弄權謀推翻清廷的過程中,有 47 位軍事將領,由段祺瑞領銜,於 1912 年 1 月 26 日發過一通電報,要求清政府放棄政權,“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⑩這一舉動,難道不是革命? 如果沒有他們的這一行動,共和的降臨恐怕還需要更多時日。因此,後來被稱為北洋軍閥中的相當一部分,都可以說是革命者。

至於袁世凱,則更加可以說是那場推翻清室的革命的重要一極。

在“傳統革命史”的認知裡,袁世凱是個陰謀家,是個反革命,他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是個竊國大盜。在辛亥革命中,他的通天大陰謀不但玩弄了清政府,也玩弄了革命派。

說袁世凱玩弄了清政府大致不差,說他欺人孤兒寡母也與事實相符,但若說他玩弄了革命派,竊取革命果實,就有些不準確。因為當時革命派的力量並未大到足以推翻清廷,袁世凱如果站在清廷一邊,革命便很難成功;如果他站在革命一邊,則清廷也很難自保,因為雖然他開缺了兩年,但北洋軍依然聽他指揮,而北洋軍乃是當時力量最強的新式軍隊。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清廷重用他,就是革命派,也努力爭取他。

如 1911 年 11 月 9 日,正在湖北前線與清軍作戰的黃興致函袁世凱,稱袁的才能“高出興等萬萬”,勸袁氏“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並稱這是袁世凱建立不朽功勳的好時機,“千載一時,祈毋坐失”。^⑪

11 月 11 日,“首義都督”黎元洪與袁世凱的代表談判時說,只要袁世凱參與到革命陣營中來,反戈北向,則“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⑫

孫中山回國之後，於12月29日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但當日即致電袁世凱，表示自己只是“暫時擔任”、“暫時承乏”，對正以“旋轉乾坤自任”的袁世凱，他“虛位以待”，^②唯恐袁世凱因南方選舉臨時大總統而改變初衷。

革命派如此重視袁世凱，袁也審時度勢，站在了革命一邊，通過種種手段，使清廷放棄了政權，中國遂實現了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轉變，完成了一次重大革命。在此過程中，要說袁世凱耍了陰謀，那主要也是向清廷耍的；要說袁世凱竊國，也是竊了清廷的國。革命後出任臨時大總統，可以說是兌現了革命派對他投身革命的承諾，也可以說是他應得的酬庸，不存在“竊”的問題。

北洋軍閥中的很多人，不但參與了那場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為主題的革命，在進入民國之後，還很以自己在革命中的表現為豪，將其作為重要政治資本。據時人觀察，袁世凱在民初有一特別心理，“謂共和係彼誘獲於清室，鄂人何功之有”。^③另，據親歷者言，1912年8月27日袁世凱在迎賓館舉辦盛大筵席招待孫中山及其隨員的時候，一幫北洋軍人在筵席開始不久即製造風波，吵吵嚷嚷中，有一種聲音特別強大，那就是宣稱“共和是北洋之功”，並罵同盟會，罵孫中山，稱孫“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④從這些細節中當然可以看出北洋系試圖與湖北的首義者、孫中山、同盟會競爭，但也不要忽視這種競爭中傳達出來的北洋系對“共和”的看重。而廢除君主制，創立共和制，乃是中國歷史上極具革命意義的事件，這也是辛亥革命的最大歷史功績。

有的北洋軍人，還直率地談論辛亥革命的意義。舉例來說，喜歡以“三造共和”自我標榜的段祺瑞，1925年2月1日在善後會議上發表的宣言中，就曾大談“辛亥革命之意義”。他說：“辛亥一役，易帝制為民主，閱時未及半載，而清帝遜位，民國政府成立，南北統一，並世史家，至稱之為無血之革命，何其幸也。國人誠一注意當時經過之事實，可得極精確之意義如下：辛亥革命之成功，完全基於民意，絕非決勝於武力。”他還分析，十多年來之所以混戰不已，不是因為辛亥革命期間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有問題，而是因為正式憲法未能確立：“垂十三年非爭則亂者，不能謂為《約法》不良之佐證。蓋國憲未定，革命因之而延長也。”^⑤言下之意，民國建立十多年以來的戰亂紛爭，均屬延長的革命。以他的身份而言，這“延長”的革命，應該不僅僅是孫中山一派的事業，因為他肯定不會說自己所幹的是反革命。因此，這一演講無異於說，北洋軍閥的重要人物段祺瑞認為，自己從辛亥以來所幹的，都是革命事業。

民國時代的軍閥是革命者，這不僅是相關軍人的自我標榜，也符合革命派的觀感。陳獨秀在1923年發表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寫了如下一段話：

秦始皇以武力兼併六國，建設統一的政制，建設統一文字，這是革命的，至於焚書坑儒壓迫言論，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贊成辛亥革命反對洪憲帝制討伐張勳復辟時，本是革命的人物，後來組織賣國機關（安福俱樂部）討伐西南護法軍，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時代是屬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以後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動。趙恒惕在參與辛亥革命及討伐洪憲時，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據湖南慘殺黃龐時，便是反革命的軍閥了。陳炯明在辛亥革命時代，在漳州時代，在討伐陸榮廷、莫榮新時代，都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後來阻撓北伐軍，驅逐孫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胡適之先生說陳對孫是革命行動，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陳炯明舉兵逐孫不但未曾宣告孫中山反叛民主主義之罪惡及他自己有較孫更合乎民主主義之主張，而且逐孫後，做出許多殘民媚外的行為，完全證明他是一個反革命的軍閥。吳佩孚在奉袁世凱命討伐護國軍時，在奉段祺瑞命討伐護法軍時，本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他討伐段祺瑞、安福部、張作霖、交通系，都是

革命的行動；因為段祺瑞、張作霖、安福部、交通系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是給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能夠得著政治上發展的機會。²⁷

按這位老革命的看法，段祺瑞、趙恒惕、陳炯明、吳佩孚這些軍閥中響噹噹的人物，都在某個時期是革命者。

吳佩孚是革命者，還不僅僅是陳獨秀一人的觀感。據陶菊隱記載，1920年，他就被武漢的學生當面高呼為“革命將軍”。²⁸

至於馮玉祥，則喜歡自我標榜為“革命將軍”，²⁹雖然他曾被人稱為“反革命將軍”³⁰。

1930年，國民黨指責桂系、馮玉祥、唐生智、張發奎等“新軍閥”，“不惜犧牲一切國家利益與民眾之利益及個人以往革命之歷史，而稱兵構亂”。³¹這無異於說，在國民黨的認知裡，這些軍閥是有過革命歷史的。如眾所知，這個時候，國民黨也被貼上了“軍閥”的標籤，國民黨與各實力派之間的戰爭被稱為“國民黨軍閥混戰”。³²

這是很有意思的，它提醒我們，軍閥與革命的問題，確實值得重新審視。在此，筆者只想提醒新革命史的學者們，可以考慮將北洋史納入新革命史的視野之中。因為國民黨雖被貼過軍閥標籤，在“傳統革命史”那裡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但李金錚卻說，國民黨的歷史在“新革命史”的範疇之內。准此以談，民國時期被貼過軍閥標籤的其他人物，雖然在“傳統革命史”那裡完全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其歷史似乎也可視為“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三、清室與革命

進一步說，清室也是革命者。這一觀點，在“傳統革命史”那裡，是不可思議的。在外憂內患的衝擊下，清室的反應是“師夷長技”，但其“自強”之夢在甲午一役中被擊碎；光緒帝有意革新，但戊戌年的變法才開了個頭就被無情鎮壓；進入20世紀之後，雖重啟新政，甚至打出“預備仿行憲政”的旗號，但缺乏誠意，敷衍塞責，終至人心離散，遭遇失國之痛。這是傳統革命史對清室的基本認知。這種認知有其合理之處，但誤會也很大。讓我們從梁啟超《釋革》一文的一段議論入手：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云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十姓。而問兩漢群治有以異於秦，六朝群治有以異於漢，三唐群治有以異於六朝，宋明群治有以異於唐，本朝群治有以異於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 Revolution 之名。³³

商滅夏之後，將夏桀流放於南巢，是為“放巢”；西周國人暴動，將厲王流放於彘地，是為“流彘”；周滅商後，將紂王梟首，懸掛在太白旗上，是為“懸首太白”；“組”是係印的絲帶，“係組”是指帝王將組係在脖子上，表示降伏。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投降時素車白馬，“係頸以組”，“係組東門”當出典於此。梁啟超說，朝貴忌諱“革”，流俗駭於“革”，仁人君子憂心於“革”，是因為大家認為“革”乃是歷史上發生的“放巢流彘”、“懸首太白”、“係組東門”一類故事。其實，這些改朝換代的舊事，都不能稱為“革”，充其量，只是盜賊相爭。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革命之事，乃“一變其群治之情狀”，“幡然有以異於昔日”。借用今天的話說，國家層面的革命，是指在國家治理模式上有根本性變革，而非改朝換代。秦漢以來雖朝代頻繁更易，但歷代群治之情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因此，不能稱為革命。這也就是他在文章開頭所說的“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謂之 Revo.者，亦有

屢經易姓而仍不得謂之 Revo.者”。在政治領域，朝代更替不等於革命，沒有朝代更替卻可能發生了深刻的革命，這一見解是有意思的。

梁啟超在這裡說，本朝群治無以異於宋明，可知在其心中，清室也不是革命者。這不僅僅從以清代明這一點來說是這樣，就是世紀之交的“新政”也是這樣。在梁啟超看來，當時的很多舉措（如科舉方面），都只是“補苴掇拾一二小節”之舉，不是根本性的，因此也不是革命。

不過，梁啟超此文作於 1902 年。到那時為止，清廷的各種措施，確實看不出能在國家制度方面帶來根本性的變革。但是，在此文發表之後數年，清廷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舉措。

如眾所知，清廷在 1905 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要回答的關鍵問題，就是中國是否可以改行憲政。考察歸來之後，大臣們都建議推行憲政改革，清廷遂於 1906 年 9 月 1 日頒發諭旨，“仿行憲政”。³⁴當時制定的方案，是從官制改革入手。

在改革內官制的階段，負責起草官制的官員們認識到，憲政的關鍵，是實行分權制衡，但考慮到議會一時難於成立，因此先從行政和司法分權入手。³⁵將以前的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門負責司法審判事宜，將刑部改為法部，專門負責司法行政事宜。用這種辦法，將司法行政和司法審判分開，以實現司法獨立。在行政系統內部，則擬成立責任內閣，以總理大臣和協理大臣為首，各部大臣均為政務大臣。立法系統方面雖然不是改革的重點，但也擬設立資政院，以防止大臣專權。³⁶由於反對聲音很大，這次改革未能確立責任內閣制度，與之匹配的資政院也成為廢案，但大理院成立了起來，刑部也改為法部了，可以說朝著司法獨立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³⁷

內官制改革告一段落之後，隨即進行外官制改革。1907 年公布的《各省官制通則》規定，各省城要改按察使為提法使負責司法行政、成立高等審判廳負責司法審判，各府廳州縣要成立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負責司法審判，並要在各府廳州縣設立議事會、董事會，推行地方自治。³⁸依此推行，則外官體制也將偏離原有模式，朝憲政體制轉變。

1908 年 8 月 27 日，清廷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雖然以“鞏固君權”為主旨，但也確實如學者所論，體現了君主立憲制的精神。與《憲法大綱》同時頒布的，還有九年籌備清單，這是清廷對憲政改革的一份完整規劃，分年列舉了從 1908 到 1916 年間應該完成的工作。這一清單中混雜了很多與憲政建設無關的事務，但在憲政建設方面，則完全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方案設計的。立法系統方面，中央要在 1910 年成立資政院，各省要在 1909 年成立諮議局，城鎮鄉議事會要在 1913 年建設完畢，州縣的議事會要在 1914 年建設完畢，這是一個包含了從最基層的鄉議事會到國家層面的國會的議會系統。在司法方面，各省要在 1915 年完成從高級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到初級審判廳的建設，加上中央的大理院，將構成四級三審的審判體制。伴隨著新的內外官制的頒布與實施，行政系統也將重新調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設立責任內閣。待這些工作和其他一些事務都完成，就頒布憲法，召開國會，完成憲政建設。³⁹

如果這一規劃完全實現，則中國的治理模式將“幡然有以異於昔日”，建立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體制。

在《釋革》中，梁啟超曾經說明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

日本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自誇耀，稍讀東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榮神聖不可侵犯，又曾遊東土者之所共聞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實食一度 Revolution 之賜乎？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為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動，無不指為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為革命人物。此非吾

之調言也，旅其邦、讀其書、接其人者，所皆能徵也。如必以中國之湯武、泰西之克林威爾、華盛頓者而始謂之革命，則日本何以稱焉？而烏知其明治以前為一天地，明治以後為一天地，彼其現象之前後相反，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十八世紀末之法無以異。此乃真能舉 Revolution 之實者，而豈視乎萬夫以上之一人也！^⑩

如眾所知，清廷的憲政改革完全是以明治維新為取法對象的。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則中國的預備立憲也是一場革命。只是由於九年籌備清單的目標未能實現，因此預備立憲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而明治維新則是一場成功的革命。

講到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不惟梁啟超有此認識，孫中山也有類似說法。1924年3月24日，當他對駐紮在廣州的滇軍發表演講時，說過如下的話：

中國革命沒有成功，外國革命有許多是成功的。離我們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⑪

維新事業跟革命事業相同，則清廷模仿日本維新的預備立憲，當然也是革命事業。這不禁讓人想起前引陳獨秀1923年發表的論述晚清以來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那段話中，有“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時代是屬革命性質的”一句。康梁在“戊戌變政時代”所做的，就是一場維新事業。

看來，從20世紀初到20年代，人們在界定革命的時候，並沒有將其限定在暴力革命的範圍之內，而是將一切帶有根本性變革的事務，均視為革命。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在那之後也一直延續。比如毛澤東，雖然在1920年代說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⑫但是，在1939年成文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說過如下的話，表明在他的意識裡，革命是有和平革命與武裝革命之分的：“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⑬到了1950年代，他則說過這樣的話：“各種突變、飛躍都是一種革命。”^⑭而在1980年代，主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則說了如下的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⑮若依各種突變、飛躍都是革命之說，則預備立憲不必說，就是梁啟超覺得意義不大的科舉改廢問題恐怕也可納入革命的範疇。^⑯若依改革也是革命之說，則1860年代以降的自強運動，以及甲午以後的各種革新，也都可以視為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清廷的革命事業，學界已有關注。如1990年代出版的郭世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雖以探討辛亥革命為主，但在作者眼中，“無論是民主立憲制，還是君主立憲制，相對於君主專制來說，兩者都屬近代政治革命的範疇”。^⑰在他筆下，清廷主導的預備立憲雖然只是“蘊藏”了“政治革命的萌芽”，但還是承認了其具有革命意義。^⑱至於同時期出版的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的著作《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則賦予了清季新政以“革命”的意義，如下一句較好地表達了其核心觀點：“粉碎了經歷2100年中國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學基礎的，不是以孫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卻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為中心的思想和體制的革命。”^⑲他的這一認識，就有點類似於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了。

既然在革命年代，人們對革命的理解並未局限於暴力革命，既然在“傳統革命史”還比較盛行的時候，就已經有學者指出清廷所主持的革新事務的革命意義，那麼，今日的“新革命史”是不是也可以考慮接納清廷的革命呢？

結語：革命方案的競爭與更迭

1907年，蔣智由在政聞社機關報《政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曰《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

黨》。⁵¹“人人皆革命黨”，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提法。在“傳統革命史”那裡，太平天國將士、義和團民、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共產黨都是革命者。“新革命史”初起時只關注中共革命，可知其意中的革命者基本與共產黨同義；李金錚新近提出國民黨的歷史也屬“新革命史”的範疇，可以推知國共兩黨將來都會成為“新革命史”關注的革命者。而當我們進一步擴大視野，轉換思維，發現被國共合作推翻的“北洋軍閥”以及被國民黨和“北洋軍閥”的前身們合作推翻的清廷也都是革命者，則幾乎等於說“人人皆革命黨”了。“人人皆革命黨”，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革命的一個顯著特徵。近代中國的各大政治勢力，不存在誰革命誰不革命的問題，而只有革命方案的不同。方案不同，就難免競爭，競爭的結果之一，便是革命方案的更替。不同革命方案之間的競爭與更替，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另一個顯著特徵。

在經歷了西方列強的炮火洗禮之後，清廷中的有識之士“師夷長技以制夷”，試圖通過在軍事、交通、企業等方面借鑑西方、大辦洋務而實現“自強”，擺脫淪為殖民地的命運。這確實帶有民族革命的意味。但是，這一方案不久就受到了質疑，如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自強運動方興未艾的1870年代就尖銳地批評，李鴻章所主持的洋務，“皆末也，無當於本計”，⁵²因為據其觀察，英國立國的根本，並不在堅船利炮，而在於議院和市長制⁵³。到了1880年代，兩廣總督張樹聲在其臨終遺摺中也說，捨棄議會政治不學，而停留在學習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道的階段，只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建議清廷“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⁵⁴

議院是立憲政治的精華，當人們將關注點漸漸集中於此，其攻擊點就不再是中國的“技”，而是中國的“政”。中國的“政”，也就是前引梁啟超所說的自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無甚差異的那一個政治體制，也就是譚嗣同在《仁學》中所說的延續了兩千年的“秦政”。⁵⁵長期以來，我們都說近代中國的革命主題是反帝反封。這裡所反的“封”，並不是先秦時代的“封建”，而是從秦始皇時代開始確立的君主專制體制，也就是“秦政”。當朝野的有識之士將矛頭指向“秦政”，試圖通過建立以議院為核心的憲政體制來實現自強、避免亡國之禍的時候，其中既有“反帝”的一面，也有“反封”的一面。從這一角度來看，在1860年代萌芽，到1900年代終於啟動的憲政改革，確實是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一部分。這一改革的鼓吹者和主持者，確實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

不過，當君主立憲這一革命方案還在醞釀階段，尚未取代“師夷長技”方案的時候，另一種革命方案便出現了，那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所提出的民主立憲方案。

君主立憲方案與民主立憲方案之間的較量構成辛亥革命的主體。當清廷被推翻、民國被建立，人們確實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大家很快發現，新建的民國離理想中的“新中國”距離太遠。因此，國民黨繼續高舉革命的大旗，新文化諸人則掀起了一場思想革命。其後，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將矛頭對準了辛亥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北洋政府。在“北洋軍閥”還沒有被完全推翻的時候，國共兩黨就起了紛爭，隨後數十年，雙方都堅稱自己革命、對方反革命，兩種革命方案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

簡言之，或者是由於革命者內部的分歧，或者是由於外部的刺激與壓力，造成了近代革命史上諸多革命方案的競爭與更迭。在此過程中，革命風生水起，波譎雲詭，前面的革命者因在後來者眼中不夠革命而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籤甚至被革命；被稱為反革命的，因不甘於退出舞台而一面繼續自己的革命路線、一面大革競爭對手的命。誠如魯迅在一則雜感中所寫的：“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這其中有太多的權謀與無數的悲歡，值得深入探究。因此，可以預見，近代中國的革命，不論是否用“新革命史”的名義，都將繼續吸引無數學者去探微索隱。

- ①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學術》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 ②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 ③李金錚：《“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南京：《江海學刊》，2018年第2期。
- ④陳紅民：《“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南昌：《蘇區研究》，2018年第5期。
- ⑤李金錚：《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 ⑥李金錚：《“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李金錚：《關於“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對〈“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應》，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
- ⑦筆者目力所及，迄今為止以“新革命史”為題的論文主要包括：游海華：《新革命史視野下的中國蘇維埃運動》，江西贛州：《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張濟順：《新革命史與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敘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賀文樂：《新革命史視野下“組織起來”之考察——以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為例》，天津：《歷史教學》，2016年第2期；代雅潔、楊豪：《“新革命史”路徑下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史研究》，福州：《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2期；常利兵：《“告別革命”論與重提革命史——兼論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總第5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應星：《新革命史：問題與方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期；陳紅民：《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南昌：《蘇區研究》，2018年第5期；唐小兵：《“新革命史”語境下思想文化史與社會文化史的學術路徑》，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另，已有學者梳理“新革命史”的學術史，如朱文通、把增強：《學術史視域下的“新革命史”研究》，河北衡水：《衡水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王衛：《近十年來“新革命史”理論研究綜述》，河南信陽：《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
- ⑧陳紅民的另外三點建議是：（1）應該注重將1949年前後的革命史貫通，考察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經驗如何影響到中共領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
- （2）應避免過度“重農村，輕城市”的傾向，適度注意革命力量在城市的發展。（3）社會學以外的方法，也可借鑑。陳紅民：《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
- ⑨⑩李金錚：《關於“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對〈“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應》。
- ⑪⑫⑬⑭⑮《陳誠回憶錄——建設台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12頁；第309~310頁；第455頁；第550頁；第563頁。
- ⑯《陳誠日記》，1950年1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檔案號：390101-0107。
- ⑰《陳誠日記》，1958年3月12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檔案號：470311-0312。
- ⑱“其實，中國近二十多年來這種分崩割據的局面，固然是開始於民國以後，而其形成則已見於光緒季世。”“咸同後，國家制兵已形同虛設，中央沒有強固的兵權，財政又落於將帥之手，而為將帥者復多膺任疆寄與民事，於是將帥遂得各私其軍以造成這個兵為將有外重內輕以致於分崩割據的局面。”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北平：《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
- ⑲李細珠：《辛亥鼎革之際地方督撫的出處抉擇——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影響》，北京：《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李細珠：《再論“內外皆輕”權力格局與清末民初政治走向》，北京：《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
- ⑳《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等電請轉奏立定共和摺稿》，天津：《大公報》，1912年1月30日。
- ㉑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2頁。
- ㉒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頁。
- ㉓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14~615頁。
- ㉔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頁。
- ㉕張國淦：《北洋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年,第44~45頁。

②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五),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第14頁。

②⑦獨秀:《革命與反革命》,上海:《嚮導》,第16期(1923年1月18日)。引用時標點略有改動。

②⑧陶菊隱:《大風思猛士:吳佩孚傳》,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第36頁。

②⑨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第十二集,台北:新生報社,1979年,第60頁。

③⑩托洛斯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施用勤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4頁。

③⑪《總理逝世五週年紀念告民眾書》,南京:《中央週報》,1930年第92期。

③⑫柯華主編:《中央蘇區財政金融史料選編》,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6年,第327頁。

③⑬⑭中國之新民(梁啟超):《釋革》,日本橫濱:《新民叢報》,第22期(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③⑮⑯⑰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4頁;第471頁;第510頁;第61~67頁。

③⑱“立憲國通例,俱分立法、行政、司法為三權,各不相侵,互相維持,用意最善。立法者議院公議全國通行之法律而奏請君主裁定頒行之事也,行政者閣部院按法律命令而施行之國家政務也,司法者裁判官糾判臣民有無違背法律命令之事也,三權分立而君主大權統之。現在議院遽難成立,先從行政、司法釐定,當採用君主立憲國制度,以仰合大權統於朝廷之諭旨。”《編纂官制大臣鎮國公載等奏釐定官制宗旨大略摺》,《憲政初綱》,上海:《東方雜誌》,臨時增刊,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奏議”。

③⑲《呈擬設資政院節略清單》(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摺,檔號:03-9284-042。

④①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49頁。

④②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17頁。

④③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4~635頁。

④④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4頁。

④⑤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頁。

④⑥“以云改革也,如廢八股為策論,可謂改革矣,而策論與八股何擇焉?更進焉,他日或廢科舉為學堂,益可謂改革矣,而學堂與科舉又何擇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閱十年,更閱百年,亦若是則已耳。”中國之新民:《釋革》,日本橫濱:《新民叢報》,第22期(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④⑦⑧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頁;第12頁。

④⑨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李仲賢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導論”第1頁。

④⑩觀雲(蔣智由):《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黨》,東京:《政論》,第1卷第1期(1907年)。

④⑪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IV),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512頁。

④⑫“推原其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Parliament)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Mayor,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繫,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弊。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IV),第407頁。

④⑬何嗣焜編:《張靖達公(樹聲)奏議》,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2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559~560頁。

④⑭譚嗣同:《仁學》,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7頁。

作者簡介:彭劍,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武漢 430079

[責任編輯 陳志雄]